



上海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选

# 聚沙集

董乃斌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选

# 聚沙集

董乃斌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聚沙集:上海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选 / 董乃斌主编.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

ISBN 7-5325-3384-0

I. 聚… II. 董…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709 号

## 聚 沙 集

——上海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选

董乃斌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5 字数 366,000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25 - 3384 - 0

1·1609 定价:4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54742915

## 序

比起许多历史更为悠久的历史来，上海大学应该算是一所比较年轻的大学，而且它雄厚的根柢本在工科，文科是后来才办的，所以，文学院是年轻中的年轻。然而，世上万事万物总是长短兼具、利弊相生。后起的院校、系科，犹如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固然缺乏丰富的积累和经验，却格外富于生机和活力，一旦认准目标，树起高远的志向，就能够一面刻苦奋斗，自强不息，一面广泛虚心学习和借鉴他人，从而迎着时代潮流，迈出坚定的步伐，攀登学术的高峰，其所蕴藏而终将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其所昭示而必能逐步达致的远大前程，都是可以预见而又难以估量的。

我以为，这就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的现状和未来。

在国家教育部、上海市的领导和支持下，在校党委和钱伟长校长的具体擘画指挥下，近年来上海大学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快，正在向“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这个目标迈进，文学院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前年，同属文学院的社会学系率先实现了博士点零的突破，在学术上跨出了一大步，这给兄弟的中文系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决心紧紧跟上，而校、院两级也确定并实施了对中文系加强支持力度的策略——单从这一二年来引进人才的气魄和规模，以及因此在学术界造成的影响来看，就很可能说明问题。

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队伍的建设也受惠于此，现在，我们已经条件在中国古代文学二级学科下组成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

色的研究方向；文学史与文学史学；中国诗学文献与理论；神话与民间文学。我们已就这三个方向组成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而且将不断强化它，以切切实实的努力迅速提升我们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眼前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就是我们一系列业务计划中的一项。

我们愿借此机会对这三个研究方向的设置和今后工作的设想（本书的编排次序也与此有关），说说我们的认识，以向学术界同行和师友们求教。

“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涵盖了古代文学研究，各兄弟院校博士点的做法多是按照时段并结合文体加以划分，形成几个研究方向。我们虽然叫得笼统，实际上也是根据梯队中各位老师的专长，将两千多年的文学史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含辽金）、元明清三个段落，每位老师都处于一个段落之中。与各时段文学发展状况相联系，各位老师对古代文体的研究也各有侧重。中国古代文学太悠久太丰富了，我们只能从专攻某一段或某种文体入手，在“点”上努力深入的前提下逐步向打通“线”和“面”的目标前进。不过，“贯通”——贯通古今文学、贯通文史哲——确实是我们心向往之的学术境界，我们将为此锲而不舍地努力，并为此而虚心学习，精诚合作。就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几位新人的加盟，我们文学史教学和科研的链环已相对完整，相信再经努力，覆盖面还将进一步拓宽。无论是对一个古代文学教研室，还是对一个古代文学博士点来说，文学史总既是常备的，又是重点的研究方向，所以这个梯队集中了较多的强手。

至于“文学史学”，那是建立在百年文学史实践和理论探索基础上的一个新研究方向，它在世纪之交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中诞生，它的成长和发展又需要文学史与文艺学乃至哲学的交叉和结合。我们相信它是一个有希望持续发展的学科增长点，因为先前曾做

过一些相关工作(如编撰《中国文学史学史》),比较有基础,所以准备投入更大力量,将其发展为我们的特长和特色,从而为文学史学学科的建立作出贡献。

“中国诗学文献与理论”研究方向与文学史关系密切而又有所分工,它以古代诗歌和诗学为对象,计划从发掘整理资料做起,既拾遗补缺,又力求使资料系统达到完备和科学,同时注意对诗学理论问题和文学批评史的贯通研究。现有的梯队中,有多年潜心于此项研究,颇有积累的同志,更有从著名的文学批评史专业毕业的博士,配置合理,后劲十足,可望较快拿出一批成果。

“神话和民间文学”本来也是文学史的一部分,但其研究对象作为文学乃至文化的源头和历来不属正统的旁支,又有其独特之处。近年来,神话和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从人才的培养到成果的完成,都有了长足进步,但仍有广阔天地,可供人们施展。而我们的梯队成员,全是科班出身的中青年学者,有的在学术界已崭露头角,有的正蓄势待发,在这片天地中定能有所作为。神话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联系着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中国在这方面属于后起之秀,可谓任重道远,但前景十分诱人。我们有信心把这个以古代文学为坚实基础而同许多友邻学科有所交叉的方向建设好,并不断扩大我们的影响。

研究方向和相应的梯队虽列为三个,但分工并不分家,首先是在古代文学内部,我们主张并希望梯队每个成员能够牢牢立足于自身原有基础,不断深入和巩固,成为某一方面的真正专家;同时立志高远,勇于开拓,虚心向师友和学界先进学习,从而在教学和研究上日益扩大自己的视野和范围。至于更大领域的贯通和理论建树,攀登巍峨的学术高峰,那是我们要长期努力奋斗的方向。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古代文学,而并不把眼光拘限于“古代”和“文学”,归根到底是为了继承和弘扬悠

久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为当代中国,也为人类世界的更加健康、更加美好做出一份贡献。在这个宏远的根本目标上,我们梯队成员的认识是一致的,这将成为我们投身学习和工作的永不枯竭的原动力。

刊印在这本文集中的,是上述三个梯队成员们近年来所撰写的古代文学论文的一小部分。编选的办法是:先由每人自己选出时间较近而有代表性的篇目,再由主编会同教研室的同志们审阅商定。论文多数是已发表的,基本上不再改动,只有少数几篇由作者做了小修改,也有个别文章是在此初次发表。编辑并出版此集,固然有展示我们的科研成果之意,但最根本的还是为了坦诚地向学界同行和广大师友求教。

我们知道自己的成绩渺小之至,我们这些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中,不过是几颗小小的沙粒而已。但佛经有“聚沙成塔”的故事,而且早已化为我们民族习用的成语。我们希望,也相信,通过诚实劳动,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将源源贡献出粒粒细沙,它们也可以为堆建雄伟学术之塔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决心踏踏实实地去做,坚定不移地为造塔而凝聚我们的力量。我们把这本论文选集的名字题为《聚沙集》,就包含着上面所说的几层意思。我们热切地期待学界同行和师友们不吝赐教,这将是对于我们最大的爱护和帮助。

我们真诚地感谢慷慨资助出版的上海大学文学院,感谢在百忙中审编并按期印成此书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我们还要在此预先向所有拨冗阅读此书并对我们提出宝贵意见的先生和朋友们,致以衷心感谢。

董乃斌

2002年11月

## 目 录

序	1
董乃斌	1
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	2
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	24
邵炳军	35
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	36
《青蝇》、《宾之初筵》和《抑》作者卫武公生平事迹考论	65
吴惠娟	93
浅论禅宗对宋诗的影响	94
试论北宋词发展的重要途径——赋化	109
孙小力	124
论铁崖派以及元季东南文化思潮	125
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观	141
罗立刚	155
宋代“文统”观论纲	156



论元人“一代之文学”观的发明	170
<b>林建福</b>	181
论楚辞体的衰微	182
<b>林国良</b>	197
唯识学的认知理论	198
<b>方旭东</b>	210
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身份考异	211
<b>张寅彭</b>	220
略论明清乡邦诗学中的“泛江西诗派”观	221
中韩日三国首家诗话纵横谈	239
<b>刘德重</b>	252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53
“长庆体”名义辨说	271
<b>钱 钢</b>	282
先秦诗学情感论发微	283
<b>周 锋</b>	310
江淹才尽与永明文风的关系	311
论文人画的渊源	322
<b>李秀花</b>	334

---

孙绰的玄言诗及其历史地位	335
<b>田兆元</b>	347
论主流神话与神话史的要素	348
论《楚辞》神话的新陈代谢	360
<b>程  薈</b>	379
唐人巫术观的文学表现	380
民间叙事模式与古代戏剧	400
<b>钱乃荣</b>	411
论纳兰性德词的人情美	412
论 20 世纪初 20 年的中国短篇小说	422
<b>杨福泉</b>	435
从“田”字看初民的宗教崇拜	436
——兼论伏羲、黄帝、后稷的神话形象与历史地位	
<b>常  峻</b>	453
西王母神话的民俗学阐释	454

董乃斌,男,教授,1942年6月出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主要研究唐代文学、文学史学、叙事理论等。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为该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该所副所长。1992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著《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与程蔷合著)获全国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二等奖。论文《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获上海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另有《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流金岁月》等专著。参与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华文学通史》等,为分卷主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宏观文学史研究》等,为合作主编。主持“九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文学史学史》,负责主编。另曾主编并撰著《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华文学通览》等。在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前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继续招收国内外博士生;并在上海大学招收留学博士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共同培养。社会兼职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等。

# 中国文学史的演进： 范式的视角

董乃斌

将近一百年前(1902年),受国外学术和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文学被作为一门专科与政、农、理(格致)、医、商等科并列了起来。随即在文学门里,便确定了中国文学史为必修的课程,并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制定了相当详细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法》<sup>①</sup>。中国文学史从此成为一门大学课程,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门学科,特别是中文系的一门主课,直到今日还是如此。同时,很自然地,它又成为教授学者和许多文学工作者的一种研究理路、一种著述方式。一百年来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讲义和专门论著<sup>②</sup>,拿最初的文学史讲义或论著与今日的同类著作相比,任何人都不难发现那变化的巨大。中国文学史的一百年,走过了从草创到成熟、从混沌到科学、从样式单一到形态多样、从数量有限到家族庞大,归根到底,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艰辛历程,其间的曲折反复、成败利钝,已足以形成一部关于文学史的专史。为了对百年来的文学史演变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也为了建设一门与文学史原理有关的专门之学,本文引入范式这一概念——众多的文学史著作可以在范式的名义下进行概括分类,

从这个角度探讨其特点和长短优劣,从而提炼出关于文学史原理的某些基本问题,既描绘出文学史学科的现状,又对它的发展趋势作出瞻望和预测。

### 一

范式,是英语词 Paradigm 的翻译,也有人译为范型、示范或典范等。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 T.S.库恩在探讨科学史、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科学革命的动力、标识等问题时,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引出了这个表达方式。所谓范式,意味着一种为科学家们所具有的共同理念,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所共同遵守的操作规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在科学实践中产生的某种公认的范例,等等。库恩认为,一门学科要成其为科学,范式的成立很重要。他甚至强调,范式的确立与否乃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依据。在他眼中大部分社会科学之所以还只能算“前科学”,就是因为它们至今尚无范式可言。他还认为,科学的进步主要不表现于渐进的演化发展,而是靠激烈的革命,其标志也就是范式的更替。至于革命怎么会发生,范式何以会变更,就不可预卜也说不清楚了,用库恩的说法,可能是“突如其来”,也可能是某个科学家的“恍然大悟”<sup>③</sup>。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当然不能全盘接受和照搬硬套,但受其思路的启发,经过理解和扬弃,却仍然不妨试用于文学史学。

据笔者了解,学界普遍认为用范式的演变来总结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不失为一种富有概括力、比较科学的方法。当然,这里首先就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决不认为中国文学史至今还处于前科学状态,也不认为文学史无范式可言。其实,实在不必把范式看得那么神秘,也不需要给范式制定僵硬的条条框框。

范式只是具备了某些基本属性的一种用于科学研究的框架,在我们用以审察、分析具体文学史著作时,范式只是一种观照角度、一种思维工具而已,没有必要为了它本身的含义而锱铢必较、胶柱鼓瑟。另外,根据中国文学史的百年发展,我们觉得其范式有一个逐步形成、渐进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体现为积累性的渐变,而不是莫名其妙的突变(当然也不排斥突变的存在),而其变化的原因也是可以探究、可以阐明,至少可以作出科学假设,而不是纯属偶然、无法知晓的。应该说,我们的范式观来自库恩的理论,又与他不尽相同。

当我们试用范式理论来观察中国文学史的百年时,分析形形色色的文学史著作的时候,首先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便是怎样来分辨一部文学史属于何种范式,或换一种说法,一部文学史属于何种范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文学史的性质,也就是给文学史下一个定义。

何谓文学史?中外学术界曾有过许多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说法,概括起来无非两种。一种重视文学的外部关系,把文学看作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感情的反应,文学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文学史便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研究文学史就是要弄清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生活渊源和不同时代背景。法国文论家朗松持此观点最力<sup>④</sup>,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克斯声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sup>⑤</sup>,显然是他的同调。他们研究文学史较多地从制约文学发展演变的外部因素着眼,其观点被人视为“他律论的文学史观”。

另一种与他们不同,强调文学的内部联系。以俄国形式主义论者为代表,更愿将文学史看成文学形式(体裁、语义、音韵、修辞、结构、手法等等)发展变化的历史,“文学史的对象是文学形式的演变本身,社会文化与作家传记对文学史的影响不在研究之列”,“研

究文学史的方法应排除心理学和社会学,不应当把文学史放在其他文化系列的范围内加以研究。”<sup>⑥</sup>他们的文学史观常被称为“自律论的文学史观”。中国的文学史家虽与形式主义论者的哲学基础与理论背景不同,但也有不少人将文学史看做各种文体兴衰隆替的历史,认为应该而且可以从文体流变的角度来写文学史。

还有很多人从作用、功能、效应等角度来说明文学史的性质,如说文学史乃大学的一门课程,教育体系中的一门学科,是研究文学的一种思维理路,是学术著述的一种形式,或认识历史的一种特殊角度和方法,等等。更有一些人从肯定和传承民族的传统文化,从破除对外国文化的盲目崇拜、鼓舞民族自信心,甚至从争夺文化话语权的角度来给文学史定性,真可谓说法纷纭,不一而足。<sup>⑦</sup>

文学史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切文学史家工作的逻辑起点,中国早期文学史家对此不能不有所思考。中国最早的两位文学史编著者之一黄人,在其《中国文学史》的总论中就是从文学史与历史文学之关系与区别、文学史之效用谈起的;不过,这位身为南社成员的热烈爱国者当时更为热衷的是将文学史作为唤醒国民意识、宣扬革命的教科书,所以他更为重视文学史的社会功用而并未从学理方面阐述文学史的性质。后于他的谢无量,在其《中国大文学史》的《绪论》中,对“古来关于文学史之著述”举出“流别、宗派、法律、纪事、杂评、叙传、总集”等七例后,只说:“今世文学史,其评论精切,或不能逮于古,然实奄有以上诸体以为书。”<sup>⑧</sup>仍然未对今世文学史之性质作进一步明确的解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文学史家也总要在书中首先对文学史的性质论述一番。钱基博在1917年草创其《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及后来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光华大学讲学时,把对文学、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义务作为一个先决问题在其《绪论》中做了阐述,这种做法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其对文学史所下的定义,既概括了同时代人的看法又具有较

长的时效性。在论述了文学的特性之后,钱氏说到了文学史:

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

后面又提到:“改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并提出文学史的“事”、“文”与“义”的问题:“夫文学史之事,采诸诸史之文苑;文学史之文,约取诸家之文集;而义则成于文史之属有取焉。”进而对他视为灵魂的文学史之“义”作出阐说:“文学史者,则所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以取其义也。”<sup>④</sup>概而言之,钱氏强调了文学史的科学性,认为它的职志在记叙(实证),功能是在观其会通(探寻演变线索和规律)。应该说,这是早期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史性质认识最明晰的表述,实际上也一直反映了当时和后来许多文学史家的共识。

说到文学史的社会功用,当然可以是多方面的,传播知识,弘扬传统,鼓舞民气,助益政治等等,就看具体如何运用;但它的功效只能建筑在其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无限夸大,更不能随意滥用。若要超过限度,利用文学史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使之超负荷地承载,那是后来人们对它的不正当利用,会逼迫它走上歧路。

近年来,对于文学史性质的反思,其基本思路是回到学术上



来。在作为“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总绪论》中，主编袁行霈对“何为文学史”提出了“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直截了当的回答”，那就是：“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其具体意思则有以下几层：文学史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具有感染力和审美价值的特点；应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来阐释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文本处于文学史的核心地位；文学的社会背景、创作主体、批评和鉴赏、传媒和接受等等，也是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sup>⑩</sup> 这些观点大体上反映了近年来学界对文学史性质问题的思考。此外，在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有关论著中，对文学史的职志、目标、内容等也颇多论述，然而对于“文学史究竟是什么”这个文学史学原理的最基本问题，却还没有从学理上给出一个明晰的回答，也就是没有一个明白的、可以为大家所接受或哪怕是可供讨论的定义。

但为了建设一门学科，这个关涉到其研究的对象、方法、具体内容和成果性质的基本定义又是必需的，因为它是此后一切运作的基本出发点。

那么，文学史的定义究竟应从哪里来？笔者以为，大量的文学史实践、实践中的成败得失，正是提取文学史定义的丰厚源泉。根据对百年来各个时期、各种类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分析，笔者觉得似可将文学史定义为：“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

这里，处于最关键地位的是“建构”二字，指的是文学史研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包括写作前的阅读、思考、设计和按某种体例把研究所得对象化的整个过程。在“建构”一词之前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和被处理的“相关史料”，是建构文学史的基础与条件，是它们的综合作用决定着文学史的模样，也就是范式。分辨文学史